

朱光潜：读书要慎加选择

1981年秋天到1982年暑假，我受教育部和上海戏剧学院委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进修美学，有幸成为朱光潜先生的最后一名入室弟子。

在北大进修时，我在北京也有个“家”，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到三里河南沙沟姑父茅以升家小住。在那间温馨的小书房里，我代他回复各种信件，并伴他谈心。他安排我晚上住在他的书房里，那张访问苏联后带回来的三人沙发，只要把坐垫翻个身，就是一张床，可以睡两个人。每次他总要看保姆把床铺好，还亲手摸摸有没有放枕头，才进自己的卧室休息。

有一次，我向姑父汇报已经拜访过北大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了，他们都对我非常客气，但我不敢多去打扰。姑父说，这两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宗白华是他在南京上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时要好的同学，宗白华的父亲宗嘉禄先生教过他地理课。朱光潜和姑父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总能碰到，1974年周总理组织他们去视察成昆铁路，在火车上，两人同住在一间软卧车厢，晤谈甚欢。姑父还感慨地说，他和朱、宗虽然同住在北京城，却有多年未见面了，嘱我代表他去看看他们。

1981年秋冬，朱先生家的住房正在大修，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带着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柯《新科学》的译稿校样，到北大图书馆教师阅览室校对。中午，他拄着拐杖回家，我怕他滑跤，常常扶他下楼。我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北大哲学系进修美学的，前两

三位大师，一帧合影

·戴 平·

天到他家拜访过，又自我介绍是茅以升的侄女，茅老让我代致问候。他说：“我是西语系的。不过，哲学系认我。”他欢迎我去他家坐坐。

我曾向他请教有关美学中的一些问题，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但回答却鞭辟入里，言简意赅。朱光潜先生还教导我：“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读书要慎加选择。”他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宗白华：晚年生活甘于淡泊

北大当时教授是不退休的。宗先生已85岁了，但精神很好，天冷总是一身中式的棉袄棉裤。平时常到湖畔散步，还亲自到系办公室取报纸和信件，来回足足有三里路。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面除了报纸、杂志、信件，还有顺路买的黄瓜、“心里美”萝卜和面条等，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拐杖。眼前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步履有些蹒跚的老人，却曾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激情诗人和旗手。

宗白华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山石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逸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灵活现了。

宗先生晚年的生活甘于淡泊。老保姆一年前病故了，靠他80岁的瘦弱的夫人操持家务，邻居们帮他们带点菜。儿子平时在城里，一两个星期才能来看老人一次。我因为是他



的发小茅以升的侄女，他夫人对我的造访和求教，总是很欢迎的。宗先生住的是公寓楼两居室，家具和装修都非常简朴。但你走进那间兼卧室的书房，和近乎清苦的物质生活相反，却是名副其实的琳琅满目、价值连城。墙上挂着中西名画的真迹，桌上、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孤本书籍、文物和古代石雕。他指着一尊菩萨的石雕头像对我说：“你细细看，多美啊！”“我上课就捧一个佛像去，可以讲两节课。”

墙上有幅静物画。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他说：“静物不过是把情感贯入很简单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融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深。”

在这里，我有幸聆听他分析中外艺术作品的精髓，解答我各种各样的提问。有一次，他问我：“你黄山去过吗？”我说还没有去过。他叮嘱我：“黄山一定要去。没有去过黄山的人，就不会懂得中国画。”我几次劝他写点回忆录，他总是说：“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1982年暑假，我在北大的进修快结束了，突然萌发了让宗先生和姑父会面叙旧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宗先生。他马上说：“好，你带我去，我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姑父知道后说：“怎么能让宗白华来看我呢？不方便。还是我去北大吧，我有车，顺便看看朱光潜先生。”我把姑父的打算传递给了宗先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张大了嘴连连说：“好，好！”听说他之后曾一连几天，拄着拐杖踱到北大的正门口，坐在石狮子旁，等候姑父汽车的到来。真是一位可爱的老人！

1982年7月7日下午3时，天气酷热，我和大表姐茅于美一起陪同姑父来到北大。宗先生那间凌乱的书房显然打扫过，干净整齐多了，茶几上也放满了橘子水、糖果和卷烟。我见宗先生头上涂着红药水，问他是怎样一回事？他告诉我，一早起来，想把房间打扫干净，爬到一张凳子上擦窗子，一不小心，撞破了头。

姑父进了门，两人紧紧地握手，互相端详着，几十年不见面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姑父送上两盒云南沱茶给宗先生。又问：“老师（宗先生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抗战时期，在内地。”宗先生喃喃地说。姑父流露出无限惆怅的神情说：“啊！40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关切地询问了对方的身体，又谈起了各自的子孙，最后谈到述著。宗先生说：“去年出了一本《美学散步》，明年可以出一本译文集子，《三叶

集》准备重版，都是些旧作，由别人帮我整理的。这几年已不写什么了。”

姑父说：“我倒还要写一些应景文章、回忆文章。”宗老说：“你和我不同，你是忙人。不过，我早知道你‘改行’当文学家了。”宗老所说的“改行当文学家”，指的是姑父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桥话》等一批有影响的科普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桥话》都读了，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这时，宗夫人在隔壁房间里，从一只老式藤篮里装着的一堆衣服下面，摸出一本精装本的《美学散步》。宗先生用他那支特别粗大的老式钢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开头就是“唐臣”两字，这是我姑父的字，对外早已不用了，但儿时的友情，对宗老来说，至今仍铭刻于心，这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啊！

姑父邀宗先生坐他的车，一起到燕南园朱先生家里去。宗、朱二先生虽然同住在北大校园内，但相距甚远，也难得见面。朱先生见到姑父和宗先生，连声说：“稀客，稀客到了！”三位老人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起来，并合了一张影（见图，左起：朱光潜、茅以升、宗白华）。

回家路上，姑父很累了，但很高兴，说：“亏得你牵线搭桥，不然我们三个老的，这辈子可能见不到了呢！”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过了9个月，宗先生也去世了，享年90岁。在朱、宗两位大师逝世后，姑父曾给我来过一信，谈起这次难忘的会见。如今，姑父也已作古30多年。三位老学者见面的情景，只剩下了这张照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摘自7月3日《新民晚报》）

初会

我初次见到屠岸先生，是在1978年的秋天。其时，他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几个月前，我刚从国家版本图书馆研究室调入人文社，后来被安排在现代部的“五四文学”组，做助理编辑兼《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业务秘书。

当我走进的时候，屠岸先生正坐在靠窗子左边的写字台前埋首看稿。我在他对面椅子上坐下后，他先问了些我的情况，接着，他又耐心地把“五四文学”组各位老同志逐一向我介绍了一遍。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好好地老同志学习。

我到“五四文学”组工作不久，屠岸先生就担任了人文社的总编辑。记得，我每次走进总编辑办公室的时候，都能看见屠岸先生正伏案忙碌着。有时候，书稿经初审、复审之后，还留有瑕疵。他见到我时，就会细心指出来，嘱咐我以后要留意这方面的问题，等等。直

到一切都妥帖了，他才会《书稿报告》的终审人一栏，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和屠岸先生在一起，如拥暖阳，让人觉得愉悦而温暖，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生出一种尊敬和亲近的感情来。

引路

1978年秋天，人文社成立了《朝花》儿童文学丛刊编辑室。当时，我初为人父，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幸运地迎来了诗神的降临。于是，就在一种32开的小便笺上，随手记下了一些所思所感。我给最初的几篇起了一个朴素而美丽的名字：《婴儿的诗》——这也是我平生写出的第一组儿童散文诗。我把习作拿给《朝花》的编辑去看，希望得到行家的指教。没想到，这组习作很快就刊登在了1980年6月出版的《朝花》第2

记忆中的屠岸先生

·岳洪治·

期上。

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在人文社西侧的朝内菜市场买好菜，正要回家，迎面就遇到了刚走进市场的屠岸先生和夫人章妙英老师。他告诉我说，已经读过了《朝花》上的我那组儿童散文诗。他鼓励我说：“《婴儿的诗》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先生的鼓励，让我对自己的文字有了自信。

1999年6月，我的第一本儿童散文诗集《星星·月亮的梦》，出版了。收到样书，我首先给屠岸先生寄上一本，请他指教。先生在回信中说：“你的儿童散文诗是你与儿子共同生活中思想感情交流而激发灵感的产物，是你本人带有童心的真情的流露。我想它会得到儿童读者的欢迎。”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够在创作上不断精进。

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屠岸先生创作和翻译的儿童诗。

后来，我陆续读了屠岸、方谷绣翻译的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以及屠岸、章燕父女编译的《瞧不见的游戏伴儿：英美著名少儿诗选》等优秀儿童散文诗作品。这些童诗的名作名译，激发起我继续创作的欲望与灵感。

2009年6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我的三本儿童散文诗集。拿到样书，我立刻给屠岸先生寄了一套。先生很快就写来了回信。从先生诚恳的话语里，我体会到了前辈诗人的拳拳爱心，和对年轻人的殷切瞩望。

真诚

2015年夏初的一天，我到和平里看望屠岸先生。那天上午，先生精神矍铄，谈兴很浓，还送了不少自己的诗集给我。回到家里，我便如品佳酿般阅读起来，并即兴写了一篇

小文。几天后，听说一位同事要去先生家，我便请其带上小文，向先生请教。几天后，收到屠岸先生的一封挂号信。

这封信，是写在一页400字的稿纸上的。在信笺右上方，有特意用红笔写出一行小字：“这是我的重外孙女（不到三岁）涂的。”我把目光，沿着字迹下面的一条红线，转到信笺的左边。这才注意到，那里有两道黑色的划痕。若不是先生特意指出，这划痕一定就被我忽略掉了。年逾九旬的屠岸先生，就是这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对我这个晚辈，也如此尊重。

然而，更令我难忘的是屠岸先生对于文章写作的严格要求，和对后辈的谆谆教导与热情鼓励。先生的教言，主要有三点：一是，“真诚”；二是，要“带着感情写”；三是，要能“打动读者”。这看似简单的三句话，实乃老人家一生写作的经验之谈，堪称文章写作的箴言警句。（摘自《传记文学》2022年第6期）